

## 适应和治理：以微观视角破解中国城市化问题

作者:刘能 来源:《中国社

当代社会科学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给予了密切关注，从宏观视角论述中国城市化进程丰富。宏观论述视角可以让人们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但由于社会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命运的具体描摹，在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经验研究视角。

## 城市化进程的微观研究：三类社会表征

从城市化进程的社会表征来看，至少有三类现象成为微观经验研究的关注焦点：早期开始的大规模“乡村—城市”人口迁移中的流动人口社会境遇的研究；其次，是人口在城市中的聚居现象的研究；再次，是对最近10年来伴随着城市扩张而产生

这三类现象可以看做是城市化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逐次展开：首先，乡村社会成员和现金收入而进入城市；但由于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因此他们只能有效的适应式生存，成为“都市中的村民”或更多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而当城市地区包括进去之后，“城中村”现象才成为焦点问题。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城市，是人口的城乡间空间移动；其次是人口在都市内的空间聚集；然后才是都为寄居者的流动人口和作为物业所有者的本地人口。

## 适应和治理：两种微观研究视角

在关于城市化进程的微观研究视角中，适应和治理是最典型的两种研究取向。分析社会变迁的一个最主要的研究取向。从其含义来看，蕴涵着一个深具能动性。事先预设了一个在社会变迁所营造的社会情境中，能自己搜集信息、依照自己的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行动路线的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存在。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应问题，早期的主要经验研究是由芝加哥学派完成的。解组和社区瓦解的理论立场，所以他们对20世纪早期美国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持批判。其适应的结果，更多表现为社会病态和社会问题。1960年以来，欧美社会学界围绕开展了一系列都市社区民族志研究，对其进行再检验，揭示出一个新的经验事实：适应生活，虽然遭受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困难和一定程度的社会隔离及社会孤立，但关系和地方性社会秩序的普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都市里的村民”争论。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类社会行动者的城市“都市里的村民”视角，而非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病理学视角。与国外同类研究一样，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移民即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上，另一部分则集中在工程移民整体上。这方面的研究主题包括：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和地位获得、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意识以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等。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语境中，治理更多地用于描述强势社会行动者对其实现过程，尤其是对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问题的干预和改善、社会对社会行为的引导和调节。因此，治理视角实际上恰好指明了适应视角所关注的系列结构性的和制度的因素：城市社会的基础设施容纳能力、城市社会的社会建设和政策供给等。因此，治理视角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管理的研究的社会改良主义取向。

在人口流动和产业聚集的前提下，土地、区位和居住空间都成了有价值的东

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国家政策和地方办法对社会。为考察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的社会治理实践，我们对城市社会的治理技术作就是要求顺利达成地方性利益为等级制政体中的最高目标作出让步和牺牲（称A类着些剥夺的意味；若治理的目标是在对能动的社会行动者保护自我利益的适应性；B类治理），这个时候，治理似乎带着调节的意味；若治理的目标是恢复性的，则正义受损的弥补（称C类治理）。

#### 适应+治理：均衡的理论框架

一个关于城市化过程个体和社区社会命运的新的解释框架，必须同时把适应组织材料。

首先是适应和治理的一个时间框架：在这个框架中，A、B、C三类治理实践行动者的适应性行为。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时间框架强调了正式行政力量和社会妥协，这是达成社会和谐的一个必要过程。

其次，是适应和治理的空间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政府所代表的正式外代表的非正式外部力量，都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加以考虑。由于市场/资本/传化过程中的具体事件中，因此在图中以虚线来标定它的领地。在这个空间框架中对象，分别接受来自“国家/政府代表的正式外部力量”和“本土社区”的治理；式外部力量的治理行为；本土社区的地位位于两者之间：它在接受来自正式外部来者实施一定的治理。相互适应是四个主体之间最为常见的社会关系，但正式外场/资本/传媒所代表的非正式外部力量作出适应，以及在面临底层社会的抵抗时。